

努力開拓革命新局面

一、廣交日本朝野人士

孫中山在倫敦居住近一年後，看到「歐洲尚無留學生，又鮮華僑，雖欲為革命之鼓吹，其道無由」，便不願久留歐洲，曠廢時日，決定離英重去日本，就近謀劃中國的革命。

一八九七年七月二日，孫中山懷著日趨成熟的革命思想離開倫敦，乘「努美丁」號輪船經加拿大的滿地可（蒙特婁）、溫哥華、南尼亞木、域可利（維多利亞）等地，於八月十六日到達日本橫濱。

當時的環境，對革命的發展十分不利。甲午戰爭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另一派別——維新派，在國內有了迅速發展，並逐漸形成為一種政治力量。一八九五年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是維新派登上政治舞臺的標誌。康有為等人的維新變法主張，成為當時社會的主要思潮，吸引了眾多的愛國知識分子和海外華僑，使改良主義在國內外佔據著絕對的優勢。因此，抱有近代革命民主思想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時人數極少，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一時尚不能為多數人所接受。

此外，孫中山在倫敦脫險後，清政府並未放鬆對他的跟蹤，仍在繼續採取各種卑鄙手法對其進行迫害。他們甚至密謀以高價雇用暴徒，在海外暗殺他。就在孫中山去日本的輪船上，也有清政府的密探監視著，孫中山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清政府軟硬兼施，硬的一套失敗了，又使出軟的手段，多次對孫中山誘降。他們分別由駐日公使李盛鐸通過日本人士、駐美公使伍廷芳通過孫眉、兩廣督署通過紳商劉學詢等，陰謀用高官厚祿誘其歸順，讓他們傳話勸誘孫中山放棄革命，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孫中山的斷然拒絕。孫中山夢寐以求的，是祖國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而決不是個人的榮華富貴。

就是在如此艱難險惡的環境下，孫中山絲毫沒有動搖自己的革命意志。他矢志不移，冒著極大風險經常往返於東京、橫濱、長崎等地，積極宣傳革命，繼續為重新組織革命力量而堅持不懈地工作，努力開拓革命的新局面。在他的鼓勵下，陸續有一些華僑參加了興中會，使革命組織得到一些擴大並重新開展了活動。

為了擴大革命的影響，孫中山還與日本朝野人士進行廣泛接觸和交往，結識了一大批同情中國革命的朋友。是年九月，他首先結識了宮崎寅藏（一八七一一一九二二年，號白浪庵滔天）和平山周。孫中山和宮崎在橫濱初次相識時，就「一見如故」，暢談革命，「相對久之」。他們兩個思想非常接近，又都是基督教徒，所以為中國革命事業結下了終生友好的情誼。經宮崎和平山周的介紹，孫中山結識了民黨領袖、當時初執日本政權的犬養毅和大隈重信等政界人士。隨後，又結識了萱野長知、頭山滿、平岡浩太郎、山田良政、福平誠、宗方小太郎等人。

孫中山這次重返日本後，有將近三年時間，一直寄居在日本。他為什麼從歐美轉向日本，把日本作為革命活動的一個基地呢？

促使孫中山這一轉變並長期堅持下來的主要因素有三：

首先，日本為中國的近鄰，如孫中山所說：「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畫也。」¹¹加上孫中山經過西遊北美和僑居倫敦近一年的觀察，瞭解歐洲沒有中國留學生，華僑也少，滯留下去徒「曠廢革命之時日」；而日本則有不少的留學生，自一八九六年清政府派出十三名學生赴日揭開了近代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序幕後，一批又一批青年東渡日本，出現了留



一八九七年秋，孫中山與日本友人在東京合影。二排左二為孫中山，後排左三為宮崎寅藏。

日熱，留學生人數日益增多，又有華僑一萬餘人，在日本可就近謀劃中國的革命。

其次，中日兩國關係源遠流長，歷史文化一脈相通，有許多的文化基因，易於相互瞭解。

孫中山相信中日是「同種同文」、「兄弟之邦」，比之西方白種人有較多的感情聯繫，容易接受，可以得到他們各界人士對革命的支持。他這一年九月和宮崎寅藏談起革命動機時就曾表示，要「拯救中國的四億蒼生，雪除東亞黃種人的恥辱」。此後孫中山亦認為：「亞洲今日因為有了強盛的日本，故世界上的白種人不但不敢藐視日本人，並且不敢藐視亞洲人。所以日本強盛之後，不但是大和民族可以享頭等民族的尊榮，就是其他亞洲人也可以抬高國際的地位。」還說：「因為日本能夠強盛，故亞洲各國便生出無窮的希望。」¹²日本對孫中山頗有吸引力，使他深信向這個國家謀求援助和在那裡發展革命力量，能夠有所作為。

還應該指出的是，孫中山很早就有中日兩國聯合共謀亞洲復興的思想，並且是他的一貫思想，在他的著述中曾再三闡述中日友好對於振興亞洲的重大意義。這也是孫中山之對外政策所以長期集注於日本的思想因素中不可忽視的一點。

第三，孫中山十分嚮往「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視其為中國爭取獨立和解放的典範。

孫中山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為中國的近代化提供了成功的經驗，他曾明確提出：「我們要中國強盛，日本便是一個好模範。」對明治維新的深刻印象，使孫中山在日後將它與中

國革命聯結在一起。他在闡釋日本明治維新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時指出：「日本明治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二步，中國革命同日本明治維新實在是一個意義。」¹³《正是根據這種思想，孫中山要向日本學習富強之路。早在一八九四年春的《上李鴻章書》中他就說：「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方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為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而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他認為，中國如能「步能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孫中山堅信學習西方，走日本的路，是實現國家富強的最好辦法，因而日本就成為他理想中的求助國家。

當時，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日本正向外侵略擴張，為了爭奪中國，它圖謀利用中國的革命勢力對中國內政施加壓力，對中國革命派給予容納和資助，相當長時間內並不阻撓他們在日本國土上的活動。這一客觀的有利條件，使孫中山得以較長時間僑居日本進行革命籌畫活動，並可就近聯絡國內各省的革命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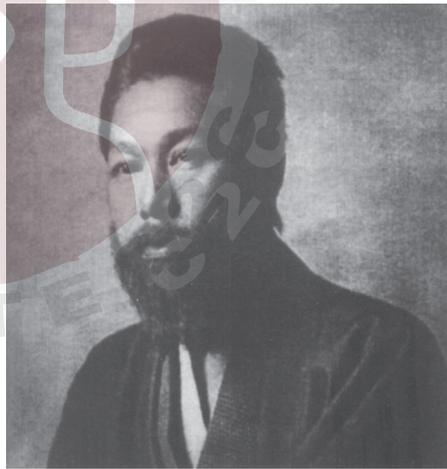
歷史證明，在當時的條件下，孫中山轉向以日本作為從事革命活動的一個基地，並把謀求外援之要集注於日本，確屬明智的選擇。這一選擇，對他日後進行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極為有利，諸如一九〇〇年的惠州起義、一九〇五年的中國同盟會成立和《民報》創刊、同盟會發動的多次武裝起義以及一九一四年的中華革命黨組建等重大歷史事件，都發生在日本

並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的多方幫助而進行或完成的。同時，大批革命黨人長期彙集於日本，有很多和日本人士接觸和交流的機會，對中日兩國人民之間此後的相互瞭解與增進友誼也大為有利。

也正因为如此，在孫中山的一生中，曾頻繁地到日本去，他前後總計十五次踏上東瀛國土，僑居時間累計達九年半之多，約占其三十餘年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因之孫中山竟「視日本無異第二之母邦」。

那麼，孫中山交往的日本朝野人士情況又如何呢？

孫中山自一八九五年秋第一次踏上日本國土，迄一九二四年冬永訣日本的近三十年中，為了謀求日本政府、軍部、財界及大陸浪人的支持和援助，曾與日本朝野各界眾多的人士廣泛交往。他交往的日本人有多少說法不一。孫中山自己記述在日本結識的友人「直接於余者而略記之」，主要有宮崎寅藏等數十人；¹⁴ 往昔一些書刊多籠統言之約數十人或百人；臺灣學



一八九七年，孫中山在日本與宮崎寅藏結識，兩人談思想與抱負，成為至交。圖為宮崎寅藏照。

者張玉法列出了一百四十六人的名單；日本學者杉山龍丸查找出有二百七十個人的名字；孫中山好友萱野長知的統計，有將近三百人之多；據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庫藏資料，舉出的與中國革命有關的日本人名單約為三百人。實際的確切數位和全部名單，尚有待進一步清查和統計。

孫中山在致日本友人的一通函件中寫道：「弟所交流者以貴國人為多，則日本人對於支那之革命事業較他國人為更關切，為吾人喜慰者必更深也。他日唇齒之交，將基於是。」¹⁵充分說明他與日本人士友誼之深厚和對日本期待之殷切。

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正是通過他所交往的眾多的日本人士結成的。孫中山認為這些人士可以影響執政者對政策的制定，從而促進對中國革命事業的幫助和中日友好的實現。然而，這些日本人類型不同、地位不一、情況複雜、態度各異。其中既有全力支持和援助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真誠朋友，為中國革命在經濟上屢有資助或奔走不懈，有的甚至為中國的革命獻出自己的生命，用鮮血在中日人民友誼史上譜寫出了動人的篇章；也有心懷叵測的假朋友，其陰險、卑鄙而又惟「利權」是圖，實際是為實現其侵華意圖的人；更有公開敵視和破壞中國革命的人。他們和孫中山交往所起的作用自然也不盡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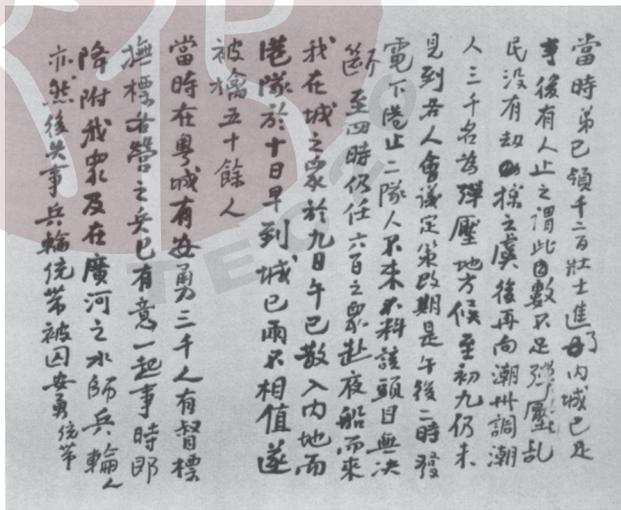
按職業來劃分，在這些日本人中，有政界要人（犬養毅、大隈重信、尾崎行雄、井上馨、

桂太郎、後藤新平等）、財界人物（平岡浩太郎、山本條太郎、中野德次郎、久原房之助、澀澤榮一、梅屋莊吉、山田純三郎等）、陸海軍將領（兒玉源太郎、寺內正毅、田中義一、青木宣純等）、外務省官員（中川恒次郎、小池張造、重光葵等）、大陸浪人（宮崎寅藏、平山周、內田良平、頭山滿、萱野長知、宗方小太郎等）、知識界（南方熊楠、寺尾亨、和田瑞、秋山定輔等）和婦女領袖（下田歌子）等多種類型。其中現職官員不多，多數是大陸浪人和在野人員。至於日本對華關係密切的東亞同文會、黑龍會的許多成員，與孫中山都有往來。可見，孫中山為尋求日本的同情與援助而交往的日本人士極為廣泛，幾乎包括了日本社會的主要層面。

這些日本人與孫中山交往的動機和目的各不相同。其中，頭山滿、內田良平等，系極端的國權主義者，其背景是日本軍閥，他們援助孫中山的目的在於以「說明」革命為代價借機為日本政府的侵華政策服務，妄圖在東亞建設日本的「皇道樂土」；而平岡浩太郎、大石正已等，屬於民權主義右翼分子，他們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寄以同情，希望在援助中國革命成功之後，能攫取在華的經濟特權；至於民權主義左翼分子宮崎寅藏、萱野長知等人，則是孫中山稱之為「俠腸義骨」的真正盟友，他們堅持不渝地無私援助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其目的是想促進中國民主革命成功，進而解放亞洲的弱小民族，共同促進亞洲的復興。

宮崎寅藏、萱野長知和梅屋莊吉三人與孫中山的關係，特別值得珍視。他們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主張，建立的是一種互相支持、互相信賴的純真友誼關係，真正稱得上是「同志」加「戰友」。

宮崎寅藏（一八七二—一九三二年），原名虎藏，號白浪庵滔天。生於日本熊本縣玉名郡荒尾村一個下級武士家庭。他的幾個哥哥都是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成長於「自由民權之家」。他以自由民權論為背景的家庭傳統和教育同孫中山的思想非常接近，他的「支那革命主義」理想，與孫中山信奉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等理想一脈相通。自一八九七年在橫濱結識後，兩人很快就建立了深厚情誼，成為生死與共的盟友。宮崎由衷欽佩孫中山的見解和為人，稱讚「孫逸仙先生是一代的大人物」，認為「在今日日本還沒有能夠跟他相比的人物，無論在學問、見識、抱負、膽量、忠誠和操守，他都比今日的任何日本人高超一等」。¹⁶他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始終持贊助態度，而且確曾在革命的艱難歲月提供了各方面的重要的支援。他和孫中山為中國民主革命並肩戰鬥，患難與共，歷經二十多年而無任



孫中山與宮崎寅藏筆談時的筆記（部分）。

何大的齟齬疏隔與裂痕。孫中山給予宮崎很高的評價，認為他「識見高遠，抱負不凡」，讚揚其幫助中國人民的「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及一生中「固窮不濫，廉節可風」，「為他人國事，堅貞自操，艱苦倍嘗」的高尚品德，肯定他對中國革命有「極偉大的功績」。

萱野長知（一八七三—一九四七年），號鳳梨，日本高知縣人，退役軍人，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堅定支持者。他曾加入中國同盟會，與孫中山一起商議興亞策略，思想達到一致，產生了共鳴。在一九〇五年至武昌起義前的歷次武裝起義過程中，孫中山對他「以東軍（按，即廣東革命軍）顧問之任相托」，期望「襄助教督，以建偉業；並懇延攬同志，以資臂助」。他追隨孫中山三十年之久，是屢參密務的戰友，對中國民主革命貢獻甚多。一九二五年孫中山逝世時，在其身邊的日本人只有萱野長知和田田純三郎等很少幾個人，也可看出兩人情誼彌深。萱野撰寫的《中華民國革命秘笈》一書，真實地記錄了他與中國民主革命的關係。

梅屋莊吉（一八六八—一九三四年），日本長崎市西濱町人。他一八九五年在香港與孫中山結識時，兩人「談天下事，中日之親善，東洋之興隆，以及人類之平等，所見全同」，一見如故，遂相引為知己。這已在前面敘及。他支持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並在東京設立機關從經濟上支援中國革命，還為一系列西南邊境武裝起義籌措資金和購運軍械。後來儘管他身處逆境，仍然多次捐款，即使負債累累而被迫出讓所經營公司的股票也在所不惜。當日本輿論指責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實行三大政策為「赤化」、「受騙」時，梅屋泰然解釋說：「我相信孫中山所做的都是為了中國革命。」他與孫中山風雨同舟整整三十年，而且在孫中山逝世後

依然情誼不衰，堅持不懈地貫徹孫中山遺志，繼續維護中日人民間的友好。

上述三位日本人與孫中山的高尚情誼，以及他們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卓著貢獻，不愧為孫中山數百日本友人中的佼佼者，堪稱中日人民友好的典範。

二、和康、梁會談合作救國

正當孫中山在日本努力開拓革命新局面的時候，國內政局發生了急劇變化。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西太后發動戊戌政變，血腥鎮壓了頗具聲勢的維新變法運動。維新派的骨幹譚嗣同、楊銳等六名志士血灑北京菜市口；支持維新的光緒皇帝被軟囚於中南海的瀛台；康有為、梁啟超在國內無容身之地，相繼倉促亡命日本。

孫中山與康有為、梁啟超都是廣東人。早在一八九三年，孫中山和康有為就在國內有所接觸。當時，在廣州行醫的孫中山得悉在廣州「萬木草堂」講學的康有為有志西學，很想與其結交，一起研討如何使中國富強起來的問題。但是，康有為當時根本沒有把孫中山放在眼裡，竟申言：「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孫中山以康有為妄自尊大，也就不再去理睬他了。現在，雙方都被迫流亡海外，孫中山不計前嫌，設想如將康有為、梁啟超爭取到革命陣營裡來，可以擴大革命聲勢。加上當時他剛踏上民主革命的征途，還認識不清革命與改良之間有著本質的不同，所以主動提出了合作的建議。當時，日本朝野人士出於對華政策的需要，亦有借此機會，促成兩派合作的意圖。所以，通過宮崎寅藏、平山周等的居

間聯絡和撮合，約定了孫、陳（少白）、康、梁四人同到犬養毅的早稻田寓所進行兩派合作的會談。

這首次會談，康有為藉故不來，由犬養毅作陪，僅孫、陳、梁三人商議。孫中山出於大局的考慮，並不計較康有為的態度，他滿腔熱忱地和陳少白一起，與梁啟超長談了一夜，耐心勸說他們轉向革命，聯合起來共同反清。梁啟超答應回去和康有為商量後答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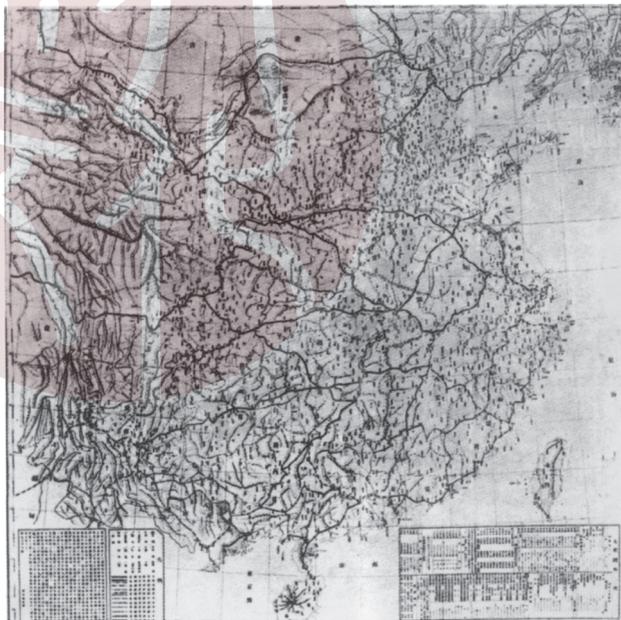
此後，他們又進行了多次會談。在一次會談中，孫中山、陳少白和梁啟超在一起，詳細討論了合作方法。隨後，孫中山又派陳少白偕平山周去拜會康有為，代表革命派要求康等「改弦易轍」，放棄保皇的改良主義道路，實行革命的辦法，共同努力推翻清政府來救中國。但是，由於康有為堅持「無論如何不能忘記『今上』（指光緒皇帝載湉）」的頑固立場，視革命為大逆不道，致使談判沒有取得任何進展。¹⁷

一八九九年，康有為在日本受到冷遇後，離開日本去加拿大，在海外建立了保皇會，反對革命。從此，便由梁啟超代表維新派再次與孫中山進行合作談判。由於梁啟超一度有聯合願望和合作表現，孫中山和他的往來逐漸密切，便又在橫濱就合作問題進行多次會談，使談判出現過轉機，並且兩派曾形成了一個合併的初步方案，準備聯合組成一個政黨，由孫中山任會長，梁啟超為副會長。不久，因為康有為得知後的強烈反對，加上梁啟超又口是心非，

合併方案始終沒有實現。此後，儘管革命運動不斷向前發展，康、梁卻一直堅持保皇立場。其中，梁啟超在合作幌子下，以「保皇為名，革命為實」的謊言，用兩面派手法竊奪興中會地盤，暗地裡大拆革命派的台，終於導致孫中山無法容忍而與之決裂了。

一九〇〇年秋季以後，孫中山對康、梁就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他在一次談話中明確指出：「我們打算推翻北京政府……沒有這個行動，中國將無法改造。南方數省人民已經組織好了，目前的平靜主要是由於我們沒有採取行動。我想，大概除了康黨以外，都能夠結成一體。」從此，革命派與改良派徹底劃清了界限，並對他們破壞革命的活動展開了堅決的鬥爭。

從一八九六年到一九〇〇年間，國內政治每況愈下，中國上空風雲日緊，英、美、俄、德、法等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陷入了日益嚴重的危境。孫中山面對著祖國災難的日益深重，對清政府的媚外賣國極為憤慨，因此，他雖處境十分困難，但再舉義旗



一八九九年，孫中山根據德國、俄國和日本繪製的中國地圖，編制了《支那現勢地圖》，以喚醒中華民族。

的意念卻益發迫切，積極準備著時機一到，便發動第二次武裝起義。在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這一整年中，他一直在作各種聯絡和鼓動工作，在春夏之交，派畢永年偕日本友人平山周等赴湖南、湖北等地聯絡哥老會，提出了興中會和哥老會聯合反清的建議。畢永年等在兩湖地區活動了一個多月，聯絡會黨工作有了顯著進展，準備在湘、鄂、粵同時發動起義。為了推進這項計畫，同年秋，孫中山又派鄭士良、陳少白等在香港設聯絡會黨的機關，與廣東三合會（反清秘密結社天地會在廣東的支派）取得密切的聯繫。同時，又命畢永年等人再入長江流域，發動哥老會各首領，並親擬「萬象陰霾打不開，紅羊劫運日相摧，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的歌訣，作為起義時的聯絡暗號。

到了冬季，十一月間，聯絡會黨的工作基本就緒後，興中會便邀約哥老會、三合會各首領在香港集會，與會者有楊衢雲、陳少白、鄭士良、畢永年、楊鴻鈞、李雲彪、張堯卿、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十餘人。在會議上，議定綱領，歃血為盟，興中、三合、哥老三會結成一個大團體，取名「興漢會」，並一致公推孫中山為總會長。會後，由宮崎寅藏攜帶特製的總會長印章赴日本送給孫中山。這一事件，具有大家公認孫中山為革命領袖的含意，說明孫中山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了。

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春夏之交，中國華北地區掀起了震撼世界的義和團狂飆。這是廣大下層人民自發行動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拯救民族危亡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當時，孫中山雖看到這是發動武裝起義的大好時機，但他沒有認識到這場群眾愛國運動的偉

大意義與革命作用，對它的單純排外行動尤為不滿。所以，他不但和這一運動沒有發生聯繫，不敢參加人民戰鬥的計畫，領導義和團共同反抗民族的大敵，而且把義和團看作是製造禍亂之人，對義和團運動採取了責難和否定的態度。只是後來，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事實的教育，他的思想認識逐步提高，對義和團運動的看法和評價也隨之有了改變。孫中山在一九〇八年指出：義和團運動表現了「中國人民有敢死之氣」，迫使列強「皆知瓜分中國為必不能行之事」，「變其政策，不倡瓜分」。對義和團運動中表現出來的中國人民不甘屈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不畏強暴並敢於鬥爭的英雄氣概，以及粉碎帝國主義瓜分中國迷夢的巨大的革命力量，已有了一定認識，在肯定其作用時給予了好的評價。而到了五四運動以後，他在《民權主義》和《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等著述中，對義和團無所畏懼的革命精神和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給予了更加熱情的讚揚和更高的評價。

正當義和團在北方沉重打擊帝國主義之際，帝國主義各國都想在「保護」其在華侵略利益的同時，乘機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因而彼此間發生齟齬，其中英、俄之間的矛盾特別尖銳。沙俄除派出軍隊參加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外，又出兵十餘萬人侵入中國東北，妄圖在那裡永久建立起他們的殖民統治。英國則想先控制兩廣和長江中下游，再與沙俄爭奪華北；但它在遠東的軍事力量不多，因而就設想利用中國地方勢力和反清力量來達到其分裂和控制中國的險惡目的。在長江中下游，拉攏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等策動「東南互保」，與清政府對外宣戰命令唱反調；在華南又策動兩廣總督李鴻章與興中會合作，脫離清政府，據兩廣

「自主」，建立一個親英政權。這一年的五六月間，香港議員英籍華人何啟，在香港總督卜力（Henry A. Blake）授意下，與陳少白密商，擬請孫中山說明李鴻章組織「獨立」政府。李鴻章幕中人劉學詢函邀孫中山來廣東「協同進行」。

孫中山得訊後，由於過去在天津投書、求見被拒絕和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他開始有些懷疑和猶豫，「頗不信李鴻章能具此魄力」；但又認為只要有利於反清以拯救祖國，也可以考慮拉攏和利用，「此舉設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試」。¹⁸

隨後，孫中山決定「分頭辦事」：一方面仍加緊準備在廣東第二次武裝起義；一方面偕楊衢雲、鄭士良、宮崎寅藏等赴廣州同李鴻章商談「合作」。他於六月一日自橫濱乘輪船赴廣州。途經香港時，得知李鴻章尚在觀望形勢，且有企圖誘捕自己的陰謀，便改派宮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內田良平三名日本人前去談判，自己乘原船逕赴越南西貢。七月間，孫中山仍打算借英國的力量推翻清政府，在南方成立「獨立」政府，來實現他救國的目的。這月十日（下午，他與香港政府三個英國人談話，力述準備在華南建立「獨立」政府的決心；二十四日，他又帶領陳少白、楊衢雲、鄭士良等與中會骨幹聯名致書港督葛力，歷數清政府禍國殃民罪狀，請求英國幫助，以「除去禍根」，「改造中國」，並提出「平治章程六則」。這些活動，表明孫中山對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階級中「洋務派」的幻想還沒有完全破滅。

也就在七月中旬，李鴻章奉清政府詔令離粵北上，在北京窺測風向，以定行止；跟著，英國準備放棄搞華南「獨立」的計畫。孫中山根據當時的形勢，認為或許有可能與李鴻章等人取得合作，便於八月二十二日由日本橫濱乘船駛往上海。當他抵滬時，英國駐滬領事對其反應甚為冷淡，而與李鴻章幕僚劉學詢的會談又毫無結果，興中會與李鴻章的「合作」嘗試最後全部落空。孫中山遂於九月一日原路返回日本。從此，他便以全力投入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

孫中山在自身革命力量還不夠強大的時候，頭腦中就一直存有不惜爭取與各種反動政治勢力妥協、「合作」的思想，以求達到拯救危難中的祖國的目的。但是，一旦經過親自的實踐，有了慘痛的教訓之後，他就能果斷地與這種反動的政治力量劃清界限，並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這一點，與改良派、李鴻章等進行聯絡的情況是如此，就是在以後他的革命鬥爭中也是不乏事例的。

三、再舉義旗——惠州三洲田之役

為了籌畫第二次武裝起義，早從義和團運動興起之後，孫中山就一直密切注視著中國北方的局勢，思考著待機而動。到這年夏季，在義和團主力進入北京、天津，反帝愛國運動發展到最高峰，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武裝干涉也已開始的時候，孫中山看到清朝統治力量遭到嚴重削弱，認為「時機已發，禍福之間不容髮，萬無可猶疑」，決定把握時機，加緊在廣東佈置

和發動武裝起義。他偕同楊衢雲、宮崎寅藏等人，不避艱險地奔走於日本、香港、新加坡之間，具體佈置起義的發動、策動和進攻路線等。六月中旬，孫中山從日本乘船抵香港海面，由於港英當局不准登岸，便在船上召開幹部緊急會議，商定以會黨為主，由鄭士良赴惠州發難，史堅如等去廣州組織策應，楊衢雲等在香港負責接濟餉械。之後大家便分頭行動。

惠州起義的行動計畫是：由鄭士良負責在三洲田發難後，率起義軍向西北方向前進，會合新安、虎門一帶由江公喜等率領的三千餘綠林，直趨廣州；由史堅如（一八七九—一九〇〇年，廣東番禺人）負責在廣州響應，牽制省城清軍使之不能出兵援助惠州。在此期間，孫中山由臺灣內渡，親臨指揮，而起義軍的軍火則由臺灣通過海運接濟。

惠州起義的武裝人員，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新安一帶的綠林，他們都配有槍支，成為起義的主力，由黃耀庭、江公喜等統率，部署在新安、虎門一帶，待起義發動後由鄭士



一九〇〇年，當長江一帶醞釀自立軍運動和北方地區爆發義和團運動之際，孫中山與興中會領導人策劃第二次反清起義——惠州起義。圖為惠州起義的直接指揮者——鄭士良。

良率領的義軍向廣州方向轉移時與之會合；另一部分是嘉應州一帶的三合會會眾，由鄭士良通過黃福召集。黃福是歸善本地人，三合會中的顯要人物。他原在南洋北婆羅洲謀生，被鄭士良派人請來，因為三合會眾對他唯命是從，他就成了召集會眾的關鍵人物。這部分人，約六百名左右，半數有槍械，作為發難的基本力量，都集中在三洲田待命。

七月十六日，孫中山在停泊於香港海面的「佐渡丸」輪船上，再次舉行軍事會議。會議決定，由於港英當局不准孫中山登岸，將惠州起義的指揮權交給鄭士良；史堅如、楊衢雲等人仍分留廣州、香港，負責策應和接濟；又派畢永年赴長江流域聯絡會黨；孫中山則轉回日本折臺灣，待起義發動後設法潛入內地親自指揮。會後，孫中山於七月二十日離開香港重返日本，隨即在神戶、大阪等地為起義商洽購置軍械事宜。九月二十八日，他由神戶經馬關抵臺灣基隆，即與日本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代表後藤新平（當地民政長官）取得聯繫，請求支援中國革命。這時臺灣日本統治當局擬利用興中會的活動插手華南，陰謀乘機佔領福建，以達到其擴張侵略勢力的目的，所以對孫中山籌備的這次起義偽表支持，應允在起義之後給予幫助。孫中山旋在臺北建立起義指揮中心，召集了一批軍事人員，等待起義軍佔領沿海一帶進抵廈門時，準備渡海接應起義。

十月六日，惠州三洲田山寨起義爆發。三洲田屬惠州歸善（今惠陽）縣，這裡群山環抱，「山深林密，路徑紆回」，形勢險要，又是會黨嘯聚之區，三合會深入周圍農村之中；同時，歸善是鄭士良的家鄉，他對這裡人地熟悉，與當地會黨及綠林首領素有聯繫，選擇在此地發

難非常適宜。當天夜間，鄭士良率領三合會的精壯人員六百多人猛襲新安縣沙灣清軍，斃俘敵七十餘人，繳獲槍支四十餘枝，清軍不知革命軍的虛實，「驚潰退卻」。起義軍猶如猛虎下山，初戰告捷，士氣高漲，接著就按原計劃向東朝福建挺進，一路勢如破竹，節節勝利，十幾日間經過佛子坳、崩崗墟等地到達三多祝。沿途屢次擊敗清軍，擊斃、俘虜敵軍數百人，繳獲很多槍械。起義軍經過的地方，人民燃放爆竹迎送，自動參軍的越來越多，一度發展到近三萬人，聲勢浩大，士氣很旺。

正當起義軍順利向前挺進時，後方的補給接濟卻出現了問題，特別是彈藥嚴重缺乏。這時計畫中的海外接濟，因日本政府內閣易人，他們顧忌染指華南會遭英、美諸國的干預，中途變卦，禁止臺灣軍火外運和日本軍人參加起義軍，使一切諾言均成了畫餅；孫中山也被禁止從臺灣渡海進入內地。這樣，起義軍雖然連獲勝利，卻逐漸陷入彈糧失繼的困境，



惠州起義期間，孫中山在臺北擔當武器供應任務。圖為孫中山在臺北的寓所——李春生住宅。

最後彈盡糧絕，又遭到清軍優勢兵力的圍攻。這時，遠在臺灣的孫中山為保存革命力量，便向鄭士良下達了命令。二十二日，日本人山田良政等持孫中山令趕到三多祝前線，書中指示：「政情忽變（按指日本臨時變卦——引者），外援難期；即至廈門，亦無所為。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行止。」¹⁹這個手令使鄭士良等驚呆了！最後，他不得已便將起義隊伍就地解散，自己率領千餘人折返三洲田，又與骨幹退往香港，不久避地海外。惠州起義半途而廢。

當起義軍苦戰惠州時，負責策應的興中會員史堅如，在廣州屢謀回應，皆因沒有機會而未能如願，迫不得已，決定用炸藥炸毀廣東巡撫衙門，炸斃署理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德壽，打亂敵人的中樞和後方，配合起義。他「以為德壽一死，清兵必自相驚擾，既可解惠州的危險，廣州也可乘機起義」。²⁰為此，他們於十月下旬租了一處位於督署後院的民宅，每晚在宅內開掘通向督署的地道，準備用炸藥炸死德壽。二十六日夜地道開通，但炸藥至時卻沒有轟發。史堅如於次日重回租宅，發現引爆導火線的盤煙燃至半途而滅，於是他再次安裝引爆盤煙後離開現場，到友人毛文明牧師家靜候消息。不料當夜炸藥雖然爆發，僅震坍撫署碉牆一角，德壽從床上震落在地面，飽吃一驚，沒有受傷。

史堅如深為疑惑。二十八日晨，他不聽友人勸告，不避危險，親到現場察看究竟，不幸為叛徒認出，被捕下獄。在獄中受盡酷刑，堅貞不屈。十一月九日英勇就義，死時僅二十二歲。

19 「日」宮崎寅藏著，P·Y·校刊：《三十三年落花夢》，上海出版合作社一九三三年版，第一百三十四頁。

20 史堅如：《致妹書》，《辛亥革命烈士詩文選》第四頁。

孫中山後來稱他「為共和革命而殉難之第二健將」，表示了深切的敬意。

史堅如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中採取暗殺手段的第一人。其英勇無畏、視死如歸的精神確實值得後人敬仰，但採用暗殺清政府權要的辦法並不是真正的革命道路，而是資產階級英雄史觀的反映。革命派並不認為暗殺主義不足取，他們在歌頌史堅如等英勇犧牲的同時大力宣揚暗殺，這就在革命黨人中助長了暗殺情緒，後來革命黨人中出現了不少暗殺活動，與革命派中個人英雄主義的滋長是密切相連的。

隨著史堅如謀炸德壽的失利，孫中山發動的第二次反清起義至此完全失敗。與乙未廣州起義相比，庚子惠州起義籌備得更充分，也擁

有一定的群眾基礎。起義前，革命黨人在會黨中進行了不少工作，參與者都目標明確，比之廣州起義多為烏合之眾不可同日而語；革命派在起義前已設立了基地，安營紮寨，武裝力量集結了數月之久，比之廣州起義臨時湊合、屆期不至，有了確實的保證；起義過程中又得到



一九〇〇年冬，孫中山與起義失敗的自立軍骨幹人物在日本東京合影。左起：尤列、唐才質、孫中山、秦力山、沈翔雲。

沿途群眾的支持，曾擴軍至兩萬餘人，而且鄭士良在進軍途中還曾到處張貼過號召人民反對清朝統治的告示，對爭取當地農民的同情支持也起了一定作用。這些都是惠州起義發動後得以取得若干勝利的重要原因。但是，這次起義的指導思想完全放在依靠日本的支持下，及至日本態度發生變化時，起義便不得不半途而廢。所以，惠州起義不是敗在清軍之手，而是敗在日本政府對孫中山的出爾反爾態度上，歸根到底，是敗在孫中山與興中會對帝國主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上。

惠州起義失敗並非偶然。當時全國範圍內反清革命的條件尚未完全成熟，革命派所積蓄的力量還相當的薄弱；特別是與孫中山把這次起義成功的希望，放在主要單純依靠外援上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外援」落空，成功也就無望了。

惠州起義是孫中山在興中會時期親自策劃的一次重要武裝起義，也是他發動的歷次起義中規模較大的一次。這次起義雖遭失敗，但影響頗大。由於廣大人民群眾的逐漸覺醒和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漲，孫中山的處境也較前



一九〇四年，孫中山與侄兒孫昌在檀香山合影。

大為好轉。當五年前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時，他被不少不理解的人視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得不到人們的支持，甚至在檀香山的親友也把他看作洪水猛獸，不敢和他接近。而這次惠州起義失敗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以前咒罵他是「亂臣賊子」的，這次反而惋惜起義沒有成功，認識到他不是什麼「強盜」了。理解、同情或贊助革命的人空前增多。這種形勢使身歷其境的孫中山感觸很深，他後來追述說：「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人民有覺醒和群眾對革命鬥爭的熱情支持，大大鼓舞了孫中山，日益增強了他的革命信心，從而開始步入一個嶄新的時期。在這個新時期中，孫中山也從一個孤獨的革命先行者成了繼之而起的民主革命派公認的領袖。

惠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化名「吳仲」，於一九〇〇年十一月離開臺灣，流亡海外。從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四年，他遠涉重洋為革命四處奔走。一九〇一年在日本橫濱、本州和歌山縣及檀香山等地，一九〇二年冬到了香港及越南，一九〇三年秋又從越南西貢往暹羅、日本和檀香山，一九〇四年春再去美洲的美國舊金山、華盛頓和紐約等地，同年底又由美洲到了歐洲的英國倫敦。孫中山歷盡了千辛萬苦，足跡遍及亞、歐、美洲許多地區，一再宣傳非革命不能救亡的道理，廣泛傳播革命思想，召集革命同志，聯合華僑和在美洲的會黨，組織革命團體；並考察資本主義各國經濟、政治和社會、歷史的發展狀況，結交外國朝野人士，爭取他們贊助中國革命。孫中山雖然飽經挫折，備嘗艱辛，其革命信念堅定不移。他這種不遠萬里，風塵僕僕，勞苦奔波，為革命不畏艱難和風險的精神，是很可貴的。

四、援助菲律賓獨立運動

孫中山在日本準備再次武裝起義的同時，對於其他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也給予熱情的幫助，他把兄弟國家人民的鬥爭看作是為世界人道而進行的共同鬥爭，要力圖聯合亞洲反殖民主義力量一起鬥爭，而不是把革命局限在中國範圍之內。他援助菲律賓獨立運動是其中一例。

孫中山是怎麼認識菲律賓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呢？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十九世紀七〇年代，自由資本主義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隨之出現了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亞洲是帝國主義列強爭奪的主要場所之一。在瓜分亞洲的「高潮」期間，帝國主義發動一系列侵略戰爭，使亞洲許多國家的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災難。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在政治上實行西方殖民主義和亞洲封建專制主義相結合的殘酷統治。在經濟上，除了直接掠奪和傾銷商品之外，還大量輸出資本，控制亞洲各國的經濟命脈。這一切，激起亞洲人民的無比憤恨，他們紛紛奮起鬥爭。十九世紀末，菲律賓率先爆發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

一五二一年西班牙殖民者首次侵入菲律賓，一五六五年菲律賓開始淪為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賓實行行政教合一的殖民統治，壟斷對菲貿易。菲律賓人民不堪忍受殘酷的壓迫和剝削，同殖民者進行了三百多年的英勇鬥爭。十九世紀末，菲律賓資本主義獲得了初步發展。隨著菲律賓人民同殖民者的矛盾日益尖銳，菲律賓出現了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一八九二年七月，安德列斯·波尼法秀創立秘密團體「最崇高的、最受尊敬的菲律賓兒女協

會」（簡稱卡蒂普南），與殖民者進行鬥爭。一八九八年八月，卡蒂普南發動起義，各地群起回應，武裝鬥爭的怒火迅速燃遍菲律賓群島。正當鬥爭進入高潮時，卡蒂普南領導層內部發生分裂，艾米利奧·阿奎那多取代波尼法秀，掌握了鬥爭的領導權。一八九七年十一月，阿奎那多宣佈菲律賓獨立，成立菲律賓臨時共和國，制定憲法，並出任第一屆總統。但是，同年十二月，他與西班牙殖民者妥協，訂立《邊那巴多條約》，規定阿奎那多政府停止戰鬥；西班牙殖民者則虛偽地允諾民族平等，進行社會改革，保護人身自由，並付給阿奎那多等八十萬比索。條約簽訂後，阿奎那多解散共和國政府，流亡香港。

西班牙殖民者並未履行諾言，菲律賓人民也沒有放下武器，他們在激進派領導下，繼續堅持鬥爭。在人民革命的推動下，阿奎那多在香港成立了「愛國委員會」，並重新取得革命運動的領導權。

一八九八年四月，美國和西班牙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美西戰爭爆發。菲律賓革命軍乘此機會向西班牙殖民軍發起猛烈進攻。美國為假手菲律賓革命軍打擊西班牙軍隊，聲稱支持菲律賓人民的武裝鬥爭。阿奎那多於五月乘美國軍艦回菲，六月發表宣言，宣佈菲律賓獨立。

一八九八年一月中旬，阿奎那多和其部下彭西（M. Ponce，馬尼拉大學畢業後留學西班牙，著《菲律賓史考》和《孫逸仙——中華民國的締造者》）接待了梅屋莊吉。這時，梅屋莊吉在孫中山的影響下，認為亞洲黃種人必須團結起來，反抗西方的侵略；亞洲各國的革命具有互相呼應、互相推動的作用。因此，應互相援助。阿奎那多和彭西完全贊同他的見解，從此，

梅屋莊吉與阿奎那多和彭西結為肝膽相照的知交。不久，菲律賓革命政府成立，設在香港的秘密機關改為外交本部。彭西負責對日本的外交事務。梅屋莊吉與他的往來於是更為密切。他為聲援菲律賓人民的反美鬥爭，積極奔走。

在美西戰爭期間，菲律賓獨立軍對日本抱有幻想，認為日本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希望它像法國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援助美國那樣，援助菲律賓。在這種意願的驅使下，菲律賓政府派彭西赴日活動，爭取援助。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為染指菲律賓，聲稱對菲律賓獨立運動抱有「好感」。彭西因此得以與日本簽訂了訂購村田式步槍五千支的協定。然而，菲律賓政府當時嚴重缺乏資金，駐香港的外交本部無款可匯，協定很快被廢棄。年底，菲律賓人民奮起抗擊美國侵略軍，軍械消耗很大。菲律賓政府再次派彭西赴日購運軍械。彭西途經香港時，拜訪梅屋莊吉，說明赴日的目的，並坦率承認，購運軍械的經費要向國際友人募集。梅屋莊吉當即允諾資助，並致信流亡在日本的孫中山，請他協助彭西。

當時，孫中山在日本正在聯絡國內外友人準備再次武裝起義，忙得不可開交，但他對其他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也很關心，要盡能力之所及給予熱情的支援。早在一八九七年，他在一次談到關於革命的動機時曾表示，決心要與亞洲被壓迫民族一起「為亞洲黃種，為世界人道而盡力救支那四萬萬之蒼生，雪亞東黃種之屈辱」²¹，而不是把革命鬥爭局限在中國的範

圍之內。

彭西到達日本橫濱後，打聽到孫中山住在橫濱本牧的南京街裡，便於一八九九年三月初在孫中山住處與孫中山、宮崎寅藏、平山周等人會晤，介紹了菲律賓人民反對美國入侵，為獨立而戰的情況，並懇切說明，堅持鬥爭需要國際援助。孫中山當即表示，如能確保登陸地點，興中會可動員廣東同志三萬人赴菲律賓投入反侵略戰爭。彭西則表示，菲獨立軍面臨最大困難是軍械缺乏，如不及時補充，將不戰自潰。孫中山就轉請宮崎寅藏幫忙，並說：「我們一旦幫助他們爭得了菲律賓的獨立，接著便可憑藉菲律賓同志的力量攻陷廣東，掀起一場大風暴，他們有錢，又有準備，我決心帶領支那的同志和部下幫助他們打仗，希望你們也來和我們一起，速其成效。」；「好，來他個痛快的，先幹它美國一傢伙。」²²宮崎寅藏與平山週二人都表示贊成。當時，因為中國革命黨人和支持他們的日本友人都受著日本當局的監視，不能直接出面去購軍火，必須找一個與中國革命黨沒有聯繫、不受當局注意的人來辦這件事。他們經過商量，決定向民黨領袖犬養毅求助。宮崎寅藏與犬養毅交往甚密，次日拜訪犬養府，說明來意，犬養毅欣然應允協助，並推薦中村彌六負責具體事宜。

中村彌六是日本眾議院議長，曾任大隈內閣的副司法相，常出入參謀本部。他們又找到了中村彌六，還沒等他們說完，這位中村就表示說：「小意思，這事我包了。」大家對他信

而不疑，彭西將全部軍費交給了孫中山，孫中山又轉交給了中村彌六。

菲律賓獨立軍領袖阿坤雅多（Emilio Aguinaldo）得彭西報告，知孫中山計畫率中國革命黨赴菲律賓助其獨立，而後菲律賓助中國革命的事，極為贊同。為表示協作之誠意，贈給孫中山日金十萬元作為革命經費。興中會得到這筆款後，在開展各項活動中，起了很大作用。當年秋季，派陳少白在香港士丹利街二十四號創辦的興中會機關報《中國日報》；派史堅如赴長江一帶，聯絡會黨，擴大興中會組織；派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接待會黨；策動惠州軍事等各項費用，就是用的這筆款子。事後，保皇黨康有為、梁啟超師徒借題在檀香山《新中國報》及香港《商報》上肆意詆毀，說孫中山「騙取了菲律賓獨立黨鉅款」云云，企圖敗壞革命黨的聲譽。這種國際間革命黨人同心共濟、患難相助的精神，是封建君主的忠實奴才們所不能理解的。兩國革命黨的戰鬥協作精神，在中菲友誼史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孫中山在等候中村彌六購運軍火時，派興中會員、日本退職武官遠藤隆夫、山下稻、清藤幸七郎、島田經一、伊東正基等赴菲律賓與獨立軍進行部署，待軍火運到，在適當時機由孫中山率中國革命黨赴菲律賓助戰。

廣東興中會員向孫中山發電表示準備起義，要他回國主持。孫中山這時在計畫組織革命黨同志赴菲律賓，就派宮崎寅藏到廣東向黨人說明情況，先穩住那裡的局勢，準備出國參加抗美援菲戰鬥。

當宮崎寅藏赴廣東途經上海一帶時，聽說一艘叫「布引丸」的船沉了，是三井商社的船。

當他到了香港之後，正遇到一個來香港旅遊的三井商社的職員。宮崎寅藏和他提起在途中聽到沉船的事，這人說：「那真不走運呀！這船不久前還是我們的，不過好在已經賣給了中村彌六，所以我們毫無損失。」宮崎寅藏聽了這人的話便惶恐起來，以為十有八九就是裝運菲律賓軍械的船。他急忙找到陳少白，兩人一同到菲律賓獨立軍駐香港的辦事處，見到菲律賓革命委員會委員長正焦灼地一個人在屋裡。他把一份日文電報遞給了宮崎寅藏，說：「昨有一電，而不能了悟，推其大要，凶多吉少，故未敢出示同志。」當宮崎寅藏給他翻譯出「船沉」二字時，他悲痛欲絕，拍案悲呼：「天何不佑吾黨之甚也，吾受任以來，購軍械之事，已失誤三次，所費已不貲，且皆吾黨之膏血，而竟付之洪流，吾將何面目以見大統領與吾國民乎，惟自殺，以謝罪。」幾個人悲愴不已，陳少白勉慰他說：「革命家苦心之所在，非千曲百折殆無有直達目的之日，古來之英雄，舉事誰非如此。」這位委員長「稍返初志而有起色」。

原來，中村彌六用一個德國人的名字做買主，以財政股的名義，從日本槍械包商大倉會社購妥步槍一萬支、子彈五百萬發、舊式山炮一門和機關槍十一挺。孫中山為運出這批軍械，於六月十八日買下三井物產公司的舊船「布引丸」，準備運到菲律賓。孫中山派日本興中會員林及、高野二人押運。七月十七日，「布引丸」滿載軍械從門司港起錨出航，約定運至馬尼拉附近一個小島，由菲律賓獨立軍接收。但「布引丸」行駛在中國浙江馬鞍島處時，不幸於二十一日遇強颱風襲擊而沉沒了。押運人員林及、高野等全部遇難。

中村彌六見孫中山因人械俱失，甚為沮喪，表示願為菲律賓獨立黨二次購買。孫中山與

彭西商議可行，再托中村彌六二次向大倉會社購了原數村田式槍支子彈，計畫取道臺灣運往菲律賓。正待雇船運載時，日本政府鑒於「布引丸」沉沒，決定取締槍支船運出口，監視甚嚴，無法起運，蹉跎數月。菲律賓獨立黨因軍械缺乏，連戰失利。

當年十月，興中會在惠州起義時，得彭西同意，借用了這批軍械。孫中山在臺灣致電東京宮崎寅藏辦理取運。宮崎寅藏派遠藤隆夫找中村彌六協助提取。中村彌六藉口要往外地，不與辦理。遠藤隆夫要他先取出軍械，再動身。中村彌六支吾其詞，要遠藤隆夫直接與大倉交涉。軍商大倉以為遠藤隆夫與中村彌六同謀，直言不諱地說：「此物原屬廢物，不如運銷國外，以圖厚利，此中村所貽與君等之利益。」於是，中村彌六與大倉合謀舞弊的勾當，暴露於眾。宮崎寅藏回電孫中山：「中村代購武器，盡屬廢物。」

孫中山原計劃前方將士得這批武器接濟後，即由臺灣潛入內地，指揮惠州起義。接宮崎寅藏電報之後，知失去後援，進展不利，令鄭士良撤軍解散，並覆電宮崎寅藏：「向中村索還械彈原價六萬五千元。」

犬養毅親自出頭向大倉交涉，要他歸還原價，大倉得贓款五萬元，中村彌六及其同夥分貪一萬五千元。犬養毅要他至少退三萬元，大倉最後答應退一萬五千元。

但當犬養毅派宮崎寅藏向中村交涉，要拿回退款一萬五千元時，中村彌六竟矢口抵賴，不退贓款。

孫中山由臺灣回到日本時，又發現中村彌六曾偽造有「孫逸仙」字樣的印章及書信等贗件。

中村彌六的狡黠行徑，遭到日本民黨內外一致譴責，後又被東京《萬朝報》載露，中村彌六惱羞成怒，拒不退款，犬養毅不得已，將他開除民黨名籍。

孫中山也請了兩個日本律師，準備向日本法院起訴，後因此案關係日、中、菲三國外交問題，而且非短時期所能解決，在黑龍會首領頭山滿出面調解下，中村彌六退款一萬三千元了事。這位堂堂的民黨幹事、眾議院議員與軍商大倉的卑劣行徑，傳聞東京。而日本也有另外一些人物，對犬養毅和宮崎寅藏等向中村彌六交涉索還贓款的事，進行責難，說他們「無情」，「無血無淚」，「欲殺中村而反自傷」，「未免太甚」云云。他們顛倒黑白到了何等程度！

孫中山對菲律賓人民反美鬥爭運動的支援，雖然由於日本奸商和卑劣政客的破壞而失敗，但是這段真誠的協助精神，在中菲友誼史上，卻留下可貴的一頁。

之後，孫中山與彭西仍不斷來往，直到一九〇五年彭西移居越南西貢菩里連街一四〇號後，孫中山每過西貢，必去訪見。而且兩人常有書信來往，互相關心著兩國革命運動的進展情況。後來彭西還著寫了《孫逸仙——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一書。在書中提到孫中山對亞洲革命運動所起的作用時說：「孫逸仙善於把遠東各國的共同問題綜合起來加以研究，因此，他成為一群來自朝鮮、中國、日本、印度、暹羅和菲律賓的青年學生的熱情鼓動者之一。」²³

23 彭西之原著系西班牙文，一九一二年在馬尼刺出版。轉引自〔美〕詹遜(M.B.Janson)：《日本人和孫逸仙》，美國哈佛大學一九五四年英文版，第七十三頁。